

驯服偶然

[加] 伊恩·哈金 著

刘 钢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4 社会制造了罪恶

伦敦,1860年7月16日。对一个民族的统计学发现是对所有民族的启发。

不论是火灾的横祸、大风的反复无常,还是生命的不确定和思想的变化,以及火灾、沉船和死亡,均无法离开环境的变迁,它们都受到像引力那样亘古不变的定律支配,并在某个极限之内涌动,所有这些概率演算均可事先决定。

这对犯罪和其他意志的行动也同样成立,所以违反定律本身也受定律的支配。

宿命论的体系将会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吗?

不,因为统计学已经揭示出另外一种变迁的定律。

在不通风的矿井中引进通风系统,你便用

一个不测事件的定律取代了另一个。

这些事件均在控制之下。

然而,有些种族比另一些种族在暴力犯罪方面具有更大的比例。

有的社会阶层更危险。

[但是]由于人类具有修正其种族的力量,在一定的界限内,他们具有改变人类行为的力量,这是统计学能够决定的。^[1]

这类语词预示着信息与控制之间的联系。统计信息导致人们发现了统计定律。收集信息使边界条件得以改变,我们也因此改变了社会定律。这样一种人类全域的控制似乎减少了人类的自由。这种思想不致酿成政治行动中道德维度的问题。那是为工业和帝国唱赞歌的充满自信的日子,那是在水晶宫举办大博览会的日子。与在政治上对自己缺乏信心相反,信息、控制与统计定律之间的关联创造出一种形而上学的困惑,这便是统计宿命论。

“社会制造了罪恶,而有罪的人仅仅是工具。”凯特尔在致维埃梅的信中如是说,这封信于 1832 年发表。这种思想制造了一场危机。临近 1836 年:“道德秩序落入了统计学的领域……对那些相信人性完美性的人来说,是令人丧气的事实。似乎自由意志仅在理论中存在。”但是:“通过修正建制或行政实践,人们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犯罪率下降。”安格维尔的这些话在当时具有代表性。^[2]

在自由意志与统计概率之间,我们更熟悉的是一整套不同的关联。量子力学的第二次浪潮,始于 1926 年,它确立了微观

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是概率性的,这一点是最起码的。冯·诺伊曼于1936年证明了第一个“非隐变量”定理:无须宿命论,纯粹决定论定律就可以成为量子物理学的基础。有些物理学家和许多好事者则推论出物理学证明了人类自由的现实。甚至时至今日仍有些人说这解决了自由意志的问题。

1830年代和1930年代在敏感性方面的对比似乎有些矛盾。在1930年代,对自然定律为概率性的信念被认为可以为了自由而使世界变得安全。在1830年代,这种前后矛盾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存在犯罪与自杀的统计定律,那么罪犯就不可能自助。在1930年,概率为自由意志腾出了空间;在1830年,概率杜绝了这种可能。

这种对比仅在表面上矛盾。在1930年代,物理学定律被剥夺了其专横的权力,长期以来,这些定律是客观而又不可更改的必然性的模型。曾几何时,它们颐指气使地命令着最轻的原子的最轻微的运动以及每只麻雀的落地。也许还有大萧条本身。[译者按:这里“落地”(fall)与“大萧条”(Fall)为同音异义,一语双关。译文无法表示出。]到了1936年,它们所描述的仅仅是任一单个的粒子未来路径的概率了。至多描述一下实体或事件的一个巨大集合的集合行为的确定性。因而,在这个集合之内,个体可以自由行动。在1830年代,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类的行为被归结为经常与引力定律相比较的新概率性定律。因之所有的定律,物理学仍然是铁石心肠。社会定律就像物理定律一样,因而也是不能违反的。1930年代我把物理学,并因之所有的定律从决定论的宝座上拉了下来。1830年代,社会定律则向物理学靠拢,因而也就是向决定论靠拢。这便是概率于1936年似乎为自由开创了一片天地的原因所在,而且也是于1836年将概率

排除在外的原因所在。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在 1930 年代,统计概率支持自由意志?有人肯定会想,一个事件处于一个(仅仅是)概率性的定律支配之下,那么该事件则可以是一种相当自由的行动。但是,在 1830 年代,许多人(如上面引证的安格维尔)认为,如果人的行动处于一个概率性的定律支配之下,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多数分析哲学家会毫不犹豫地说,安格维尔时代的人们显然是错误的。也许,这便是理性所教导的,但是,那不可思议的反叛理性的感情却并非未被察觉。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当我出去买张晨报时,我会稍微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动售货机里有份报正等着我。当我在回家的路上,在书报摊上问是否有最近几天没有卖出去的旧报纸时,回答从来都是没有。还有其他人已经在那里把我的给买走了。

我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犯罪统计数据来开始这样的思考,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有关分布的技术。统计宿命论的首次初步探讨是有关巴黎居民几乎不变的信函的数字,这些数字是在死信办公室收集到的。拉普拉斯曾注意到这个现象,1819 年 T. 扬这位博学之士对此进行了讨论。他向人们保证,这里绝不隐含任何“神秘的天命”,但这个例子却沿用了好几十年。^[3]

头脑冷静的分析观认为统计定律可以应用于某些人群,但是该人群中的各个成员仍然是自由自在地去从事他们乐意的事情。定律仅对个体的集合有效。没有任何定律能限制我买份报纸,即使对我的邻居有这么一个定律。尽管这是一种敏捷的和愉快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和有关人的统计定律讲和。它们已经粗暴地深入到我们有关个人责任的思想。

比如说,我们不清楚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不定期地去法

庭旁听案件审理的人知道法官和陪审团所面临的问题。当我写到,一个 23 岁的年轻人被控有罪,他谋杀了他房东太太三岁的幼女;在凶杀之前他把那孩子强奸了;然后他将装有尸体的垃圾袋从车窗抛了出去。法官并不在乎什么宽大,他几乎是在道歉地说:“我知道你过去的生活处境绝对是可怕的,但即便如此,你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八年之内没有假释许可的可能。”辩护人强烈要求宽大处理,其理由是这个人的过去,仿佛他犯下滔天大罪是出于情不自禁。所谓的统计定律成了辩护的理由。(“一个在孩提时身体和性方面遭父母施暴的人有 87% 的概率成为一个施暴者,等等。”)这个人并不真正负有责任。即使终生从事这种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远远不能确定这类统计学上的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

我们得益于狄更斯那入木三分的讽刺性作品的恩惠。《艰难时世》这部小说以其反功利主义和反统计学著称于世。茜茜那个可怜的小姑娘甚至说不出“统计学”这个词。她跟老师读的最好结果也就是发出一串不连贯的音。可那个老师却坚定地教授着统计定律不可违背的道理。小说的结尾,老师那可恶的儿子汤姆被人揭发是个贼。

“如果我遭雷击,”父亲说道,“也不会比这件事更能使我震惊。”

“我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儿子嘟囔道,“有好多人的差事都是靠信用谋来的;还有好多人,十有八九吧,都不讲实话。我听你说过一百多遍了,说那是个定律。我能对定律有什么法子?你把别人都痛骂过了。我的父亲大人,还是自己消消气儿吧。”^[4]

狄更斯对功利主义统计学深表不信任。他给人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不相信统计概括的有效性。今天,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仍未找出一种办法来处理统计衰减及其对责任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以仁爱之心看一下安格维尔初次遇到诸如此类问题时的情形。

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倘若 1820—1840 年间没有出现雪崩般的数目字,以及随之而来的统计定律的观念,我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法官不会去向杀人犯道歉;他会欣然地称他为野兽并判处他死刑。统计定律与自由之间的另一个关联依然会与我们同在。法尔的讲演表明了这一思想。人们不是注定要遵循统计定律,因为法律适用的条件是能够改变的。有城市大火的定律,但是消防队长、建筑法规和城市规划可以改变这些风险。同样,对社会各阶层也是如此。我们行政管理者改变了城市景观,因而改变了火灾的危险。同样,我们(统治阶层)可以改变应用于他们(被统治的阶层)的定律。

这对统计学包含宿命论的断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应。它似乎承认了这一点!法尔说他在拒斥宿命论,但他却坚持一种严格的社会决定论。被统治阶层的成员仍然是在一个统计定律的范围之内,尽管这个统计定律是由善意的官僚选出来的。

凯特尔和法尔之辈代表了 19 世纪统计学慈善和功利主义的一面。这是其主要的方面。此二人似乎都有最具价值的直觉。他们想改变劳动阶层的命运,而且他们以为通过实行一种新的控制方法,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去发现什么是支配犯罪、疾病、罪孽、骚乱的统计定律。然后,寻求改变这些定律应用的条件。古雷利是实证主义者:道德分析应该获取立法者赖以决策的数据,但不能对立法者有所建议。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

分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凯特尔,至少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位改良主义者。年度犯罪率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所以立法者应该引入变革的方法使其得到修正。法尔不仅视自己为综合统计事实的人,而且视自己为提建议为己任的人。^{〔5〕}

对伟大的改良运动表示同情的读者只想称赞法尔之辈丰富的直觉,但是他们也不应忽略另外一面,那就是法尔所创建的权力基础结构之一的诸功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社会才如此运作。我们获取被统治阶层(其行为令人不快)的数据,然后试图改变我们以为是与该阶层相关的条件,从而改变该阶层服从的统计定律。这便是美国所谓“自由主义的”政府行政方式的实质。美国学校通过接吻以达到强制性取消种族隔离的做法就是著名的一例。19世纪,这种立法的意图是善意的。对情况了解最多的我们改变影响他们的统计定律。这便是狄更斯讽刺的要点之一。

我并不谴责功利主义积极分子在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没有比卫生改革者更为成功的了,他们彻底改写了每个人平均寿命的记录。洁净水和洗涤早在得到广泛支持的或有根据的疾病细菌说之前便创造过奇迹。多数积极分子强烈坚持“坏空气”(瘴气)或瘴气致病说。在一开始,他们希望清除臭水,不是因为臭水本身是病源,而是因为它产生的臭气熏天,从而传播疾病。尽管他们行动的基础是错误的,他们迎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人口爆炸。公共卫生运动横扫全世界,彻底增加了人的平均寿命。^{〔6〕}

目的是改善卫生状况,但让我们不要忘记死亡率。世纪末叶,地主和雇主被强迫在其公寓或工厂的厕所里安装抽水马桶。这股推销热针对的是劳动阶层的健康,而不是死亡率。装有抽

水马桶的厕所的目的是作为一种建筑结构,它可以确保身体自然功能的隐私,是将父母与孩子卧室隔开的那扇墙壁的自然延伸,是核心家庭的最后一种物质形态的法典。然而,当与洁净安全的自来水结合起来时,它还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卫生措施。几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道德与卫生在功利主义者的头脑中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这些话可以暗示卫生与道德的结合是一种结构设计,通过这种设计,富人就能够对穷人的行为进行调节。然而,有人会说,许多改革都是在慈善热情的外衣之下进行的,其真正的作用在于维系业已确立的秩序之类。也许是这样吧,但是,几乎对卫生与道德不作什么区分的社会组织对那些顺遂的阶层也同样适用:“道德原因以及对精神的调节,也许对有教养的阶层更有影响,但所有这些应该从户外活动中获益。”在此,新鲜空气和体育活动旨在预防癫狂和自杀。^{〔7〕}

无论如何,统计定律适用于所有阶层。它是关于“他们”的、关于其他人的定律,因为他们要被决定、被分析、他们是立法的基础。处于讨论中的诸阶层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是社会现实。劳动的、犯罪的和殖民的阶层必然是需要进行改造的主要对象,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了解雨果在其名著《悲惨世界》中所描述的现象,即使是将其改编为音乐剧。从书名上看,它对我们是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文学作品,但在当时却是统计学家们所使用的标准技术术语。^{〔8〕}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人物包括绑匪、乞丐、无赖、弃儿、妓女。

显然,如果根据年龄、家庭条件和行动进行跟踪并将数据精确化,那么,这一阶层(妓女)的统计数据,对政治家在

确定不良品行、生活方式的第一动机以及受惩罚的可能和监督组织方面，一定是非常有用的。^{〔9〕}

妓女和政治家：我不需要进一步强调受到监视的他们和从事必要监督的我们。

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各个阶层之外，还有我们称为种族的较大的阶层。对我们而言，种族的首要内涵是肤色。法尔在他的讲演中谈到了种族，他所指的是任何民族，部族或者由遗传和遵从一致风俗的家族。他说“人类有修正种族的力量”，因而开始了优生学。

在最近一些年，凯弗尔斯和其他人使我们认清了优生学运动，这场运动的开路先锋是高尔顿，并由他的门徒皮尔森继续。^{〔10〕}我将不去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但需要作两点声明。首先，这项运动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坏名声；然而，人们常常忘记了这项运动正是由那同一种慈善的功利主义所发起的，其出发点也是以修正人口的一切“自由主义”企图为基础的。其次，优生学的根源要比通常假定的早一些。其根源在凯特尔关于决定人口特质的统计定律的思想中已见端倪。法尔在世界统计学家面前的讲演证实了这一点。没过多久，他便从火灾治理转移到社会阶层管理，继而转到种族的管理。

他讲演的直接主题并不是这些，而是统计宿命论。根据这一信条，如果一条统计定律适用于一组人，那么该组人的个人自由便受到限制。很容易将此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早期统计思想中出现的怪异现象。事实上，它表露出以统计信息为基础的关于人口控制的一种初期困惑。统计宿命论是一种集合性疾病的症状。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关于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担忧，

这种担忧近乎歇斯底里。我们几乎不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理性思维的例子。事情就是这样。然而，症结不在于形而上学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隐藏在背后的问题不是灵魂选择的力量，而是控制国家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力量。

无论如何，这其中既有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有政治的争论。这种宿命论仅仅是因果性、必要性、决定论思想过渡期中的众多标志之一。这一断言在第十八章中获得了力量，届时我将检讨这个时期有关决定论的一些怪现象。在此，我只简单提一下统计宿命论，因为波特已经将事件的进程作了详尽的描述，而洛汀对凯特尔本人对这一主题的看法也有上乘的分析。^{〔11〕}

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但不是统计宿命论。这是个新东西，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统计定律。让它成为统计定律吧，明年某某地区又将有一定比例的人自杀。那么（似乎可以推出）每个居民具有不自杀的自由，就能不成立。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做的自由，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有人这样做的事情，归根结底，那就不是关于人口的统计定律。

在 1820 年之前，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出现。然而，有一条真理说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颅相学已经面临许多逻辑问题。“这门新型的研究不仅引起科学家和几位学者的兴趣；它还从哲学的庇护所和学术界传到了沙龙，确实，它传入了多数有闲人的生活圈子；它一直是，而且依然是所有谈话的主题，是一种积极的猎奇对象。”^{〔12〕}现在我们认为，颅相学是一个愚蠢的游戏，它通过头骨隆起来算出某人的个性。的确，那些标出“官能”的头颅图是可笑的，颅骨隆起代表不同的特质，如“好色的或多子女的”。^{〔13〕}我们可以拿邻近器官及与之相关的官能相互影响的模型来取乐。^{〔14〕}但是，R. 扬和其他人却令人信服地证明，颅相学

(我们认为纯粹是错误的)是使疾病在特殊器官中定位这一更大规模改革的一部分。^[15]

“最根本的是,在头、颅骨或大脑以及思维的某些特性的形式之间,是否果真存在这样一种整齐的对应关系。”^[16]加耳和施波兹海姆认为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他们错了。但是,除了有关颅相学的医学和心理学问题外,还有道德的一面。假定人的各种品性是由大脑中诸器官确定的,那么,一个人的好色、傲慢、羞怯、贪婪就是情不自禁的,能是这样吗?那么,他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那是他的品性,他是否对残害人的肢体罪负责?

有人认为器官与犯罪或创造性的“倾向”有关系。英文词 *propensity* (倾向),是由波普尔重新启用而流行开来的,他于1950年代首创了概率的“倾向”说。“倾向”在颅相学中是一个艺术术语,但是它与概率宿命论的关系更为密切。法文是 *penchant*。凯特尔的统计学表述是同一的:犯罪倾向 (*penchant au crime*)。施波兹海姆采用倾向来反驳宿命论的指控。首先,我们的某些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可能选择自己是老大还是老幺。我们的某些精神的和道德的品性也是给定的,正如出生时其他身体上的特征是给定的一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其中蕴含着宿命论呢?“意志的官能,以及决定意志的动机,是给定的和天生的”,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17]

施波兹海姆的某些讨论有效地把我们的预期颠倒了过来。唯物主义者说物理学定律支配一切;对于施波兹海姆则刚好相反。“物理学定律从属于化学定律;引力,比如说,是一个物理学定律;它由化学亲和力予以修正。”^[18]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从属于有机的定律,而有机的定律最终从属于人类官能的定律。“自由存在于做或不做任何事情的可能性之中,在了解动机和根据这

些动机来作决定的官能之中。”因而，一个自由的人是了解自己的倾向的，是了解他自己的动机的。意志始于了解和反思的官能。道德始于义务和公正的官能。道德自由是应用于绝对良心的意志。^{〔19〕}

好大夫是不会对每件事都持赞成态度的。加耳承认有邪恶的倾向；而施波兹海姆则予以否认，认为道德上的邪恶“存在于行动之中，而这些行动对整个适应于人的官能都是不愉快的”。这又回到了古代关于宿命论和自由的争论上。有涉于统计学的颅相学的要素，是它创造了一种将倾向从决定因素中分离开来的论证。莱布尼茨的旧口号——“没有强迫的倾向”——被派上了新用场。

统计学家们也同样徒劳。有犯罪的倾向，是的，但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帮助他的道德力量。这使人想起施波兹海姆的等级体系。但是还有一些额外的统计学的因素，它们在问题的转换过程中也显得相得益彰。自由选择被视为细小的独立原因（如第十二章所描述的那样），这样便可以不去考虑那幅大图景。“个体的数目越多，个体也就越容易淡出，并听任由一般事实组成的系列处于支配地位，这些事实有赖于一般原因，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也就在于此。”^{〔20〕}

由此可见，在凯特尔那里，自由行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细小原因，从而允许较大的规律存在。相反地，这些较大规律并不排除个体的自由意志。但这样会不会蕴含着一种关于人类自身的宏大的宿命论呢？凯特尔肯定了功利主义对种族改进的主题。为了避免全球宿命论，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完美性。文明的进步基于道德条件的变更，这对我们的道德条件来说也同样如此。^{〔21〕}

然而，真正使统计决定论的争论白热化和家喻户晓的，却不

是统计学家及其反对者。麦克斯韦看到了这一点,“研究社会问题的统计学方法在科学方面有拉普拉斯,而在普及方面则有伯克尔这位阐释者。”^{〔22〕}伯克尔在 1857 年出版了他的《英国文明史》之后,成为伦敦社交季节[译者按:指初夏时期]的名人。一部 19 世纪的文明史能否基于统计宿命论?是的,我们的老朋友,自杀的统计学,确认了这样的宿命论:

在一个给定的社会里,一定数目的人必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普泛的定律;而至于谁将犯罪这样的特殊问题,当然要有赖于特殊的定律了;然而,在他们的整个行为之中,必须服从大的社会定律,在社会定律面前他们都是附属品。而大的社会定律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论是对生命的热爱还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恐惧,都无法阻止其运行。^{〔23〕}

注 释

〔1〕法尔这位能力非凡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户籍处处长,在第四届国际统计学大会上所致的欢迎辞。大会主持人阿尔伯特亲王也在他的发言中过多强调了宿命论的主张。

这些语句是摘录,是按其读出来的顺序摘录的,来源为法尔的讲演辞:《第四届国际统计大会》(*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ongress*)(伦敦,1860)第 4 页起。有关法尔的传记,见埃勒尔:《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医学:法尔的思想和方法》(*Victorian Social Medicine: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William Farr*)(巴尔的摩,1979)。

- [2] 安格维尔:《论精神异常和犯罪倾向的年龄影响》(*Influence de l'âg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 et sur le penchant au crime*),《比利时皇家科学与文学院通报》(*Bulletin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 du Bruxelles*)第3卷(1836)第184页起。同样的担忧亦表露在他的著作中:《法国的人口统计……》(*Essai de la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considérée sous quelques uns de ses rapports physiques et moraux*)(布尔格,1836)。在这部著作中表达了实证主义者的感情:“当统计学被忠实地应用,没有任何特殊意见体系的承诺以及数量和时间都足够充裕的时候,它便是最佳的理性之源。”还提到了我在各章中提到过的许多问题,例如教育与犯罪之间的相关性。古雷利和巴尔比利用国防部各部门有关招募人员的信息来判断该部的人员教育水平。安格维尔敦促司法部、教育部和国防部采用同样的教育水平的度量手段,从不同的经验中求导出有意义的比较。
- [3] T. 杨:《物理观察和地球密度的误差概率的注记……》(*Remarks on the probabilities of error in physical observations, and on the density of the earth considered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reduction of experiments on the pendulums*),《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第109卷(1819)第71页。
- [4] 《艰难时世》(*Hard Times*)(伦敦,1854)第三部,第七章。
- [5] 法尔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户籍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of England and Wales*)末尾所发表的《致户籍处的信》(*Letter to the Registrar—General*),总是引人入胜。例如,产褥热是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最终的解决方法(助产士和医生应洗净自己的手并消毒其医疗器械)通常归功于塞梅耳维斯。许多年之前,法尔在他的年度信中就斯托尔斯的研究以及同样的建议包括进去。法尔继续在卫生助产术方面培训妇女。这也许还是对妇女的一种补偿,“今天没有几个有利可图的领域是为妇女准备的”。在将这两种不

能相提并论的社会问题的结合中,法尔是理性功利主义的化身。产褥热在英格兰长期存在证明其影响有限。

斯托尔斯:《产褥热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puerperal fever; containing a series of evidence respecting its Origin, Causes and Mode of Propagation),载法尔:《英格兰和威尔士户籍处的信、年度报告》(Letter,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 General of England and Wales)第4卷(1842)第384—393页,转引自《地方杂志》(The Provincial Journal)第166期。

- [6]对于法尔及其同事而言,卫生与财富是手拉手的。“可以肯定,没有任何夸张的危险,有可能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减少30 000人死亡,并以同样的比例增加人口的活力(我也许不该加上工业和财富?;因为疾病是苦难的硬指标,但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在力量、健康和幸福面前疾病便退缩。”

法尔:《英格兰和威尔士户籍处的信、年度报告》第1卷(1839)第89页。

- [7]法尔:《英格兰和威尔士户籍处的信、年度报告》第3卷(1841)第84页。
[8]《国际统计学大会:第六届议程表》(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programme de la sixième session)(佛罗伦萨,1867)第89页。

- [9]同上,第93页。这项运动从农村到城镇,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有关穷人的数据到1867年已经标准化了,且相互关联:性别、公民身份、合法的父系?教育、出生地、固定住址?贫穷的主要原因?残疾(盲、聋、哑、肢残、精神病、白痴)?后来人们又转移到家庭状况,父系家庭的道德状况等。

- [10]凯弗尔斯:《为优生之缘故:遗传学与人类遗传的应用》(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纽约,1985)。

- [11]波特:《统计思想的兴起》第151—92页;洛汀:《凯特尔……》第五章。

[12] 莫罗:《加耳博士的思想体系》(Idée générale du système du docteur Gall),载《拉瓦特尔先生利用观相术对人的认识……》(*L'Art de connaître les hommes par la physiognomie de M. Lavater, augmentée des recherches ou des opinions de la Chambre, de Porta, de Campa, de Gall sur la physiognomie*)(十卷本,巴黎,1806)第2卷第47页。

[13] 例如,见克鲁克香克:《颅相学的证明……》(*Phrenological Illustrations, or the Artist's View of the Craniological System of Drs Gall and Spurzheim*)(伦敦,1826)。

[14] 1815年的颅相学家:

休谟先生主张我们对因果关系一无所知,有的只是遵守齐一的前后相伴随出现的现象。我们承认,恒常性前后相伴随的现象使人联想到诸观念,它们通过共同租用(*cotation*) [原文如此]原因、通过激发某特殊的官能而相互联系起来,然而,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因果性观念是某特殊器官的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在动物中是没有的。它由专司比较的器官在每侧标明。施波兹海姆博士说,这个器官问道,为什么?它便将询问转化为原因,而这一点正是哲学家品性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

几年以后,乔治便试图用大脑中的器官辨别康德先验分析论中的诸范畴(原因、实体等等),但是在他临终前公开承认这是错误的。

福斯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新解剖学和物理学素描……》(*Sketch of the New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of Drs Gall and Spurzheim Considered as Comprehending a Complete System of Zoonomy, with Observations on its Tendency to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of Punishment and of the Treatment of Insanity*)(伦敦,1815)。乔治:《论神经系统……》(*De la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t spécialement du cerveau*)(巴黎,1821)第1卷第104—111页;有关1828年公开承认错误的情况,见戈